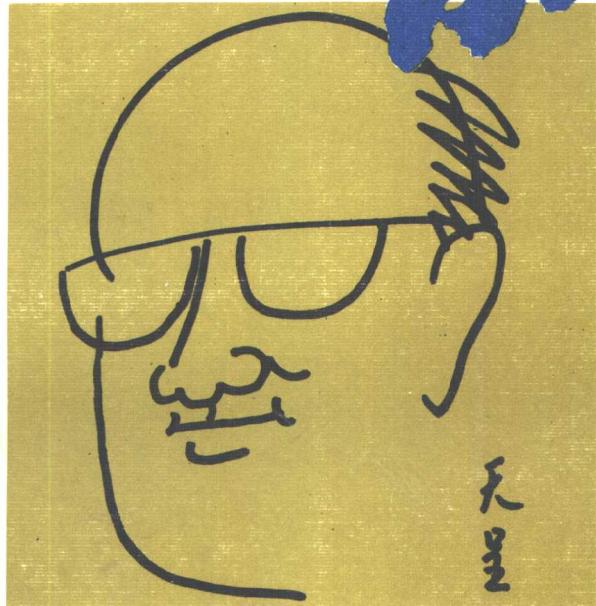


我就是我

邓伟志 ■ 著



对「我」应该怎样评价，一直有争议；对「我的书」
应该怎样评价，也是一直有争议。

争议吧，社会永远是充满争议的。争议吧，我的名字
叫邓伟志，我的号就叫邓争议。我以我的书能引起争议而
自豪。

上海三联书店

我 就 是 我

邓 伟 志

上海三联书店

(沪)新登字 117 号

我就是我

邓伟志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书在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1.25 插页：4 字数：280,000

印数：1—3,000

ISBN 7-5426-0663-8/G · 121

定价：17.00 元

自序

本来打算把1978~1992年在报刊上发表过的五百余篇短文汇集成册，因受篇幅和一些纯技术原因的限制，这里只收进了一部分。在这少部分中除了有十几篇曾被京、沪等地的十余种杂文集转载过以外，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入”书。

有人说，杂文是短命文学。这话虽说不对，但也不是全错。杂文时代感太强，往往容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流逝。我的杂文更是如此，寿命可能是短中之最短者也。

但是，如果把许多杂文串起来，则可以把它看作“历史的心电图”，看出各个时代跳动的脉搏。我的杂文，不消说起不到这种作用。我只不过是飘浮在时代洪流上的一片树叶，很难根据我的杂文绘出时代的画卷。

不过，关于我的杂文，有一点值得自豪，那就是有感而发，决非无病呻吟。“感”多“发”少是有的，“感”强“发”弱是有的，把冷“感”成热也是有的，我不能保证所感均准确无误，但是，“有感”则是毋庸置疑的。如今不像过去，写奉命文学，凑违心之论。十多年来写的杂文，全是我写的，是在不写憋得慌，不写手发痒的情况下提笔的。即使有的文字是编辑要我写的，那也是一拍即合，自己跳出来的。我乐于对这些文字负责，乐于为其优负责，乐于为其劣负责。在这次成书时，我甚至把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合时宜的文字也保留了。保留的目的不是让谬种流传，而是不愿讳疾忌医，不愿隐恶扬善。我一直反对在出文集时把当初的文章“现代化”，我一直主张在出

文集时不要篡改原文。要改，就应该像马恩修改《共产党宣言》那样：加注！不然，岂不是太难为历史了？我一直认为我的文章有优有劣，今天依然这么看。如果只有优，没有劣，那就不像我了。我就是我。我对自己一分为二。把《我就是我》献给读者时，我就像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让读者去解剖。让读者把无病变的器官取出来，供他人移植；让读者把有病灶的器官取出来，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供“社会医学”陈列室作标本。这就是我出这本书的目的，也是书名取《我就是我》的用意。

为了便于庖丁解牛，我在编排时一律依文章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这样编排，有个优点，那就是便于读者看出我在哪年哪月写什么，哪年哪月写得多，哪年哪月写得少，什么时候甩开膀子写，什么时候捏手捏脚写，什么时候出妙笔，什么时候多败笔。多与少，妙与败，都是出于我之手。我就是我。我是把短文当日记、周记来写的。短文是日记，是思想日记，是前进的足迹。足迹即使被风雪掩埋，雪化之后还会再现。足迹是时间的音符，时间是足迹的五线谱。这便是以时间为线索编排《我就是我》的用意。

保留历史的本来面目，尊重历史的公正仲裁。“真”字在本书中是大写的。

作者

1992年12月26日

定稿于天纵书洞

目 录

自序

越鸿沟记	(1)
“少见”必“多怪”	(3)
想起了粟理依	(5)
丰富知识与解放思想	(7)
庐山醉石	(9)
摩天楼优劣论	(12)
赵一曼、曹聚仁及其他	(14)
提倡反批评	(16)
让教授回到教室和实验室去	(19)
美与丑	(21)
我摸了老虎屁股	(23)
耳朵、腋下“认”字目击记	(25)
关于“专”的对话	(27)
开发精神能源	(29)
净土不净	(31)
学会的风气	(33)
重唱一句歌词	(35)
智力的“返老还童”	(37)
之初，性本“？”	(39)

师爱说	(42)
科幻小说应当宣传科学	(44)
杂家也是专家	(46)
婚姻瘤及 N 射线	(49)
画鬼与见鬼	(51)
从《响导》批评孙中山说起	(53)
还得继续打鬼	(55)
尤利·盖勒出了风头之后	(57)
在玻璃瓶子面前	(59)
灵学中的“特功”	(62)
我所知道的钉螺姑娘	(64)
康德与“特异功能”	(66)
灵学这个案不能翻	(68)
重视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	(70)
赞“年鉴热”	(73)
请他们入“主宾席”	(75)
争当“小百科”	(77)
文人相“?”	(79)
“成套家具”和文化建设	(81)
中年人也要当人梯	(84)
也谈婚礼改革	(85)
不可不懂 XY	(87)
信息与调查	(88)
谁是科学的“伯乐”?	(89)
笑谈哭嫁	(90)
为“以书养书”撑腰	(92)
知识分子的“时空观”	(93)
“马太效应”外一章	(95)

开展家庭咨询	(97)
从马克思的成熟说起	(98)
“特别值得注意”	(100)
“阿堵”勿却	(102)
通婚与高攀	(104)
科学与伦理	(106)
在听汇报时	(107)
打开人体的“黑箱”	(108)
希特勒限制妇女就业以后	(109)
对名人有二忌	(111)
劝君数一数微机	(113)
并非艺术夸张	(115)
“影象”的印象	(116)
从邓志伟家走出以后	(118)
在北京长城饭店	(120)
算帐算到“只剩一块砖”	(122)
为《夜光杯》谈夜光杯	(124)
从“糌粑”说到生活方式	(126)
登嘉峪关	(128)
站在长城上的思考	(130)
刮目看敦煌人	(132)
“海市蜃楼”又一解	(134)
写在伯乐还乡之后	(136)
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137)
为苍蝇打抱不平	(139)
民主出智力	(141)
赤橙黄绿青蓝紫	(143)
为错误争一席	(145)

淡化“当官心理”

——谈当官与做学问的函数关系	(147)
不正之风知多少	(151)
流行色没有国界	(153)
闲暇不闲	(154)
要有自己的观点	(156)
从舞蹈跳开去	(158)
重视信息的优化	(160)
抱瓮与蹲墙根	(161)
由“锁链理论”所想到的	(163)
山崩于前	(165)
行在流行前	(167)
欢迎妇女经商	(169)
我的爸爸	(170)
“食洋不化”考	(172)
先“读”为快	(174)
高干子女问题	(175)
假如花木兰还活着	(177)
谢绝来客启事	(179)
对“三毛阿爹”意见的由来	(180)
抬头之必须	(182)
清静之余	(183)
漏室铭	(185)
“特”字的引力	(187)
我与文汇报同年生	(189)
现代社会的黄牌警告	(191)
“对话”要容错话	(193)
“夜生活”在悄悄降临	(194)

献给某些领导一个数字	(196)
《越鸿沟记》的前前后后	(197)
不读书则无用	(199)
“窝里斗”总归是丑陋的	(201)
王实味的待遇	(203)
文人的“四清病”	(205)
出路在于年轻化	
——写在告别年轻时代的前夕	(207)
清贫是病	
——二谈文人的“四清病”	(209)
加一条文德	(211)
我与我的书	(212)
三谈文人病	(221)
年轻化和改革速度	(223)
息怒六法	(224)
我为什么写作	(227)
站在中流砥柱上	(228)
一个儿童眼中的淮海战役	(230)
关于企业家的送“杯”精神	
——兼谈企联盟	(233)
我与妻子的默契与矛盾	(235)
提高“德先生”的社会地位	(239)
我爱不爱看电影？	(241)
人与牛	(244)
我吃过的野菜	(246)
评《诬告有益论》	(248)
我不是官	(250)
我吃过的好菜	(252)

赞广开言路	(254)
我与老虎	(256)
三十年疑窦一夕解	(258)
我与麻雀	(260)
“三不之道”	(262)
坐冷板凳	
——嘉业藏书楼一瞥	(265)
包公祠里的笑声	(267)
人比雀儿累	(269)
想起了余勉教授	(274)
我的皮鞋	(277)
我爱竹篱笆	(279)
我坐过花轿	(281)
春风已改旧时装	(283)
牛鉴毁于仪仗	(285)
也谈黄逸峰	(286)
谈文场	(288)
我与相思豆	(290)
养狗的哲学	(292)
忆邓式月饼	(294)
学会辐射性思维	(295)
无舵船	(296)
对书要一分为二	(297)
白茆纪事	(299)
对付乱开会的诀窍	(301)
良化“心理气候”	(303)
地缘的力量	(307)
了解人 关心人	

——一个老共产党人的故事	(309)
可把送“梨”当送“礼”	(311)
到了天尽头以后	(312)
刘云昭二三事	(314)
“雷经天事件”的启示	(316)
高品位的难题	(318)
扫除“障目”的“一叶”	(320)
腰	(321)
跑中写	(323)
我睡眠的三个“比”	(326)
学着对付折腾	(328)
对战犯的跟踪调查	(330)
我有多少母亲?	(332)
正确评估人才	(335)
打开边门	(337)
无限风光在险峰	(339)
也谈“弼马瘟”	(341)
怎么又重来?	(343)
重读《正处》的联想	(345)

越 鸿 沟 记

两千多年来，人们都以鸿沟来比喻那些不可逾越的事物。就连象棋棋盘上也标有“楚河”（即鸿沟）字样。其实，鸿沟并非不可逾越。最近笔者就越了好几趟。

鸿沟是条“7”字形的大沟。它从河南荥阳起，向东经开封，把黄河与当时的济水、汴水相连；向南利用当时的沙水上游，经淮阳，把黄河与颍水、淮河相连。鸿沟从黄河引水的地方，也可以说是“7”字的转折点，就在今天河南荥阳一带。我在今年4月，来到了荥阳，并沿鸿沟走了一阵，方知鸿沟不深也不宽。没有水的地方，我们骑自行车跑过去；有水的地方，浅的我们就赤脚趟过去，深的我们就从桥上走过去。据介绍的同志说，没有一处会因河面太宽，不便架桥，而需要乘船。

今天的鸿沟，几经沧桑，挡不住人们的去路，过去的鸿沟怎样呢？是不是不可逾越呢？过去的鸿沟无疑是水的，决不会像今天那样交通方便。但是，就是在项羽与刘邦以鸿沟为界，平分天下的时候，恐怕鸿沟也不是那么难以越过的。要不，刘邦怎么能够在以鸿沟为界的协议墨迹未干的情况下，听了张良与陈平的献策，便很快越过鸿沟，挥戈东进，追击楚军呢？楚霸王之所以跑到乌江自刎，还不是因为汉军大踏步越过鸿沟了么？

楚汉以鸿沟为界，是在鸿沟开凿后一百多年的事。这是项羽的一厢情愿。其实，开凿鸿沟的本意，没有半点挡住人们去路的用心。相反的，倒是为了方便交通。开凿鸿沟是从魏惠王10年（公元前361年）开始的。战国时魏国很富强。今天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东

部、中部，都是魏国的领土。魏惠王时，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原，想把国都迁到中原。要迁都，非要交通先行不可。他们为解决运兵、运粮问题，前前后后用了十多年，挖出了这五百余里长的大鸿沟。后人把它看作大鸿沟，而在当时是空前规模的大运河。它构成了以人工运河——鸿沟为“干”，以自然河流——淮、泗为“支”的水系。由于鸿沟的沟通作用，在鸿沟水系的干、支流沿岸出现了不少经济都市。像笔者所到的荥阳，就是秦汉时代的屯粮重地。还有鸿沟入颍的陈（今淮阳），它西通韩都，南控楚都。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军，也曾以陈为都城，利用鸿沟水道运兵运粮。《史记·河渠书》上说：“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禹贡》是魏惠王时写的。书里面反映了他们要利用鸿沟统一中国的强烈愿望，事实上这条沟在统一中国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

地球上的鸿沟不是不可逾越的，并且已经逾越了。地球与月球的鸿沟也不是不可逾越的，如果说嫦娥奔月是神话，那么飞船登月则是事实。将来，把牛郎与织女隔开的那条特大鸿沟——银河，想来也有被逾越的一天。我们既要看到鸿沟有隔断交通的一面，更要看到它有沟通的一面。不可逾越是相对的，暂时的，可以逾越是绝对的，是可以创造条件实现的。科学无禁区，征途无鸿沟。禁区一定要打开，鸿沟一定要越过。这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战斗精神。

原载《解放日报》1978年6月26日

“少见”必“多怪”

有些人看了影片《望乡》后，对于妓女上银幕，总觉得难以理解。而我对他们这种难以理解的心情也感到不好理解。不过后来，想起不久前在云南边疆上碰到的一件事，也就开始理解了他们那种难以理解的心情。

我们曾在金平县这个多民族地区搞过科学考察，在那里常常要骑着马翻山越岭。一天早上，陪同进行考察的同志忽然对我说：“今天要走一段再上马，不然马要踢人。”我有些愕然：“为什么前几天不存在这个问题呢？”陪同进行考察的同志说：“前几天是在傣族区，你们穿白衬衫还不显得突出；今天是在苦聪族区，你们的白衬衫就成了奇装异服了。不但苦聪人奇怪，连苦聪马也对你们不顺眼，所以……”我听了，深感这几句话寓有哲理。来金平后，我这个汉族人一直是处于“少数民族”地位。对儿童的围观，我已习惯了，至于马看了也会不顺眼，实在是没想到。——想到这里我懂了：对某些人来说，看到银幕上出现妓女，就觉得难以理解，不就和苦聪人把白衬衫当作奇装异服一样，都属少见多怪吗！

妓女是历史的产物。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妓院。妓女的生活是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的一个剖面。不要以为妓女成天寻欢作乐。“枕上潸垂泪，花间暗断肠。”这两句描写妓女的古诗，是毫不夸张的。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先生除了写过农民史以外，还写过一部《日本妇女史》，书中以很大篇幅叙述妓女的生活，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实质。井上清在剖析了妓女之后，犀利地指出：“最强调‘家’的重要性的社会，却剥夺了几十万男女的家庭，最

严格地要求妇女守贞操的武士社会，实际上却以历史上最大规模来加以蹂躏……。”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妓女的苦难生活，是这个罪恶社会的一个侧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懂得旧社会是怎样摧残妇女的，就不懂得新社会是怎样解放妇女的。因此，问题不在于写不写妓女，而在于怎样写妓女和如何看待妓女。

解放以后，我国曾有不少描写新中国改造妓女的文艺作品。可惜，这些书在“四害”横行时，都成了“禁品”，封了起来。十多年来，人们只能看“三突出”的模压作品，自然一见《望乡》就觉得“不突出”；十多年来，人们听惯了批“中间人物论”，自然是一见阿崎，就觉得不顺眼。“少见”必“多怪”啊！

感官是大脑加工厂的“原材料采购员”。尤其是视觉这一感官，是大脑的主要“采购员”。大脑的信息量 70% 来自于视觉。因此，人们思想的解放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视觉的解放。“风物长宜放眼量”，要冲破“四人帮”长期搞的禁锢政策，“放眼看”的工作现在只能算刚刚开始。今后还要不断放。在放的过程中，自然还会有人“多怪”。而要减少“多怪”，就要拉他们更上一层楼，以“穷千里目”。

原载《文汇报》1978 年 11 月 25 日

想起了粟理依

本世纪30年代，有件事轰动了国际针坛。这就是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粟理依，决然辞去司长职务，甘当针灸师。莫非粟理依要作“欧洲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否。粟理依的政见与法国当局并无二致。姑且不论粟理伊的政见如何，单就其丢掉乌纱帽去捏银针这一点来讲，就够人们“深省”的了。

面对着西医轻视中医、中医轻视针灸的现状，我们想起了粟理依。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官僚，尚且情愿弯腰屈膝去为人扎针，而我们管针灸的“针官”，为什么至今不肯变外行为内行？更有甚者，那些已经捏起银针的年青人，为什么还觉得不如握手术刀吃得起呢？这些人总觉得针灸是土办法。是的，针灸确是我国土产，不是舶来品。但是，这一中国土产，千百年来一直被国外视为洋货，加以引进。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有五十多个国家用针灸治病。一些暂时还没有开展针灸研究的国家，有的正邀请中国针灸专家去传授，有的正派人来中国学习。近年来，北京、上海、南京，已经办了十多期国际针灸班，为世界各国培训针灸人才。我国古代的针灸书籍早已被译成好几种文字，最近有的国家又在重译。现在世界上有几十种针灸杂志，单日本就有十二种之多。显而易见，针灸是货真价实的舶“出”品。这本来是值得中国人引为自豪的事，怎么有些人反倒觉得脸上无光了呢？不是口口声声要学西医么，怎么偏偏不去学习西方学习中医的那点精神呢？

也有些人总觉得针灸太奇了。西医长期治不好的病，针一针就好了，谁见了都会觉得出奇。据外国报道：法国一针灸专家在德国